

中文古地图编目感悟

吴寒

从1929年9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设立舆图部开始至今，国家图书馆舆图组已有了长达90年的历史。直到今天，舆图组在藏品数量与质量、人员专业程度、编目规范制定等方面，仍然走在国内图书馆的前列。作为一名舆图组的工作人员，我有幸参与了一批中文古地图的编目和整理工作。在我看来，编目人员就是读者和藏品之间的桥梁，读者在接触藏品之前，往往只能通过编目信息来判断其内容。因此，在编目中为读者提供准确、全面的信息，便成为我们的基本工作职责。

舆图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献形态。首先，从形制上来看，舆图以单幅或多幅形态为主，由于大部分都不是书籍形式，也就不具备相对完整的装帧形态和出版信息。这既增加了鉴定工作的难度，也使得图上有限的信息变得特别重要。大致说来，我们拿到一幅图应该首先看它的边角空白区域有没有文字信息。舆图上能辅助分析其年代、作者的信息主要有几种：一是图名，大部分古地图上都有图名，它能反映一张图的基本内容。二是出版信息，少量地图会标明出版信息，位置一般在板框下方外侧。如馆藏《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》，右下角有“癸卯荷月刻板永存圆通常住置”字样，这便为我们了解此图的年代和作者提供了重要信息。三是题跋，有些古地图上会有相关说明文字，介绍此图的绘图缘起，如馆藏贾铨《太华全图》左上方有贾铨题识，交代了制作此图的前因后果。除此之外，由于地图属于图绘，有些文人会在舆图上题诗盖印，这也能成为我们解锁舆图的钥匙。

其次，从内容上看，由于舆图表现的是地理信息，因此掌握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，运用方志、史地工具书、数据库等就非常重要。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馆建“中华古籍资源库”“数字方志”数据库等对于编目工作都非常实用。除此之外，对地图上地理信息的识别还有一些事半功倍的办法，例如清代帝王的避讳，江苏仪真为避雍正皇帝名讳改名仪征，道光年间为避道光皇帝名讳将广宁门改名广安门等等，避讳的情况在地图上非常多见，把握了这些关键的地名更迭信息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地图上定位一些具体的点，从而比较迅速地判断一幅地图的大致年代。另外，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也能为我们判断地图年代提供参考，例如雍正年间“改土归流”之后，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管理，并在这些区域设置相应的行政区划，因此对于一些大型地图，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一区域的绘制情况来判断其绘制于“改

土归流”之前还是之后。

再次，从表现方式上，相较于书籍、拓片等多以文字形式传达信息，地图则以线条、符号、颜色、文字注记等表现地理情况，因此对于地图的编目也应注意其符号语言。一般来说，古地图中往往以方形、菱形、圆形等表现不同层级的行政区，对于山岳、河流、军事驻防、堤坝等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符号表现方式。而一些地图中的特殊符号也往往能为编目工作提供重要参考，例如馆藏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，图中出现了三角形、正方形、圆形三种符号，每种简单符号各有八种颜色，一共形成了二十四种符号，遍布于整张地图。而经过核查相关区域情况，我们可以推测，这些符号的颜色分别对应八旗的八种颜色，形状则对应不同民族，三角形为汉军旗，方形为蒙古军旗，圆形为满军旗。这些符号分布于内城和皇城区域，代表了当时八旗步军在京城驻防情况，这样我们对于这幅图也就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。

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古地图的传承。由于技术和管理等原因，古地图的绘制非常困难，因此一种地图一旦产生，往往会对其后的地图产生较大的影响，形成相应的图系，有时底本中的错误会以讹传讹，有时出于种种考虑摹绘者会在底图基础上进行更改，这些都能为我们确定舆图年代提供更有效的信息。因此我们在编目时，也应核查馆藏和其他图书馆所藏舆图的情况，注意对比同一图系的其他地图，有时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古地图的编目涉及到多种知识领域，每一幅地图里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，与现代地图的精密测绘和高度符号化不同，古地图的表现方式更为多种多样，“错误”的产生有时也透露了古人看待世界、思考世界的独特方式，这也使得古地图的编目工作成为一个非常有趣、充满挑战的过程。如果我们能对每一件藏品的编目保持一种严谨的、敬畏的心态，就能够对每一幅图进行全面细致的探究，这也相当于对它进行了基础性的鉴定、研究工作，读者看到这个编目信息的时候，也就能有更高效率的判断。这样也能避免读者大老远来到国图，结果发现这幅图根本就不是自己需要的。所以，编目工作是一项基础性业务，它对我们的能力是全方位的锻炼。